

拂菻僧：关于唐代景教之外的基督教派别入华的一个推测

林 英

拂菻国使者在唐代曾 7 次来到长安，学界一直认为这些使节可能来自拜占庭帝国，或是入华传教的景教僧。但是，唐代社会习惯称景教僧为波斯僧，而不是拂菻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还存在着有意回避拂菻一词的线索。此外，《酉阳杂俎》中由拂菻僧记载的拂菻、波斯植物表现出古希腊药典的行文格式。本文分析了 7 世纪前后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宗教纷争、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叙利亚的基督教派别面临的情况，以及唐代拂菻贡品的产地，做出如下推测：拂菻僧可能是东迁至中亚的叙利亚迈尔凯特派，他们拥护拜占庭帝国和希腊正教，因此才会自称来自拂菻，即当代的罗马帝国。

关键词：拂菻 景教 迈尔凯特派 唐代 拜占庭

作者林英，1968 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拂菻使者的确切记载始于唐代，^①据《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拂菻国曾七次派遣使者来到长安，下面将有关的记载按年代排列如下：

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

乾封二年（667），遣使献底也伽。

大足元年（701），复遣使来朝。^②

景云二年（708）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③

开元七年（719），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

^① 隋唐史料中的拂菻大体指拜占庭帝国。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提出，拜占庭帝国自建国以后一直被称为罗马（Rum），在伊朗方言中则被称为 Horom（亚美尼亚语）和 Hrō m（钵罗婆文），在花刺子模语和粟特语中又演变成 Frō m。中文的拂菻是从粟特语的 Frō m 音译过来的。这种观点已经被中外学者普遍接受。参见，P. Pelliot, “ Sur l’ origins du nom Fou-lin”, *Journal Asiatique*, 1914, 497-500. 有关拂菻问题的各派考证参见，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一册，79-83 页。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 1961 年版，第二册，149-152 页。裕尔著，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 页，注 18。

^② 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

^③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朝贡。^①

天宝元年(742)五月,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②

20世纪初,夏德(F.Hirth)认为,贞观十七年向唐王朝派遣使者的拂菻王波多力是罗马帝国五大教会中的叙利亚教会宗主教的名号,波多力并非人名,而是 Patriarch(阿拉伯语 Bathric)的译写,但是,唐代史籍中记载的波多力实际上是驻锡波斯的景教会宗主教。他这样论述道:

公元540年之后,安条克陷入萨珊波斯之手,许多叙利亚基督徒在波斯定居,波斯的景教会宗主教或许会将这个尊号(即安条克或称叙利亚教会宗主教的尊号,译者注)占为己有,因为他的流亡身份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对于波斯景教徒以及景教徒之后的中国信徒而言,他就是一切基督徒的宗主教,哪管西方的异端教会作何感想。正是景教会宗主教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至于他是否受命于安条克的更高层宗主教,抑或自作主张,我们还难以确定。^③

夏德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以后关于拂菻使者身份的探讨。如白鸟库吉和赫德逊(C.F.Hudson)虽然不完全同意夏德的观点,但是认为开元七年和天宝元年由拂菻王派遣的大德僧属于景教传教士。^④岑仲勉、阎宗临则同意夏德对拂菻王波多力的论证,认为其实际上是景教会大主教。^⑤另一方面,齐思和、Barrett等学者认为这些拂菻使者来自拜占庭帝国,同中国的景教传教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夏德的观点仍然影响着他们的论证,那就是,天宝四年(745)玄宗皇帝发布诏令,承认聂斯托里派改称大秦景教,原因在于中国的景教徒力图强调景教与拜占庭帝国的渊源。^⑥

夏德对拂菻王波多力的比定无疑是有说服力的。^⑦从对音来看,波多力与 Patriarch最为接近。这就意味着贞观十七年首次来朝的拂菻使者很可能由某个基督教团体派出,而开元七年与天宝元年的拂菻使者则被称为大德僧,9世纪初段成式著《酉阳杂俎》中更明确提到了一位名弯的拂菻国僧,这一切都显示出拂菻来使浓厚的宗教色彩。实际上面对着由夏德的研究引出的两个问题:首先,拂菻的大德僧是否就是景教传教士?其次,拂菻僧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如何?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③ F. Hirth, "The Mystery of Fu-lin", *JAOS*, 30 (1910), p.9.

^④ 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5页;白鸟库吉(K. Shiratori), "Futsurin Mondai no Shinkaishaku", *Tôyô Gakuhô*, December, 1931; July, 1932. 1956年此文英译本出版,后由榎一雄编入《白鸟库吉全集》,第七卷,东京都岩波书店,1971年。

^⑤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2页;阎宗临:《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27页。

^⑥ 齐思和:《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35-36页;T.H.Barrett, "Buddhism, Taoism and the eighth-century Chinese term for Christianity: a response to recent work by A. Forte and others", *BSOS*, 63.3 (2002), 555-560.

^⑦ 有关波多力身份的各种观点,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一册,97-98页。

二、拂菻僧与波斯僧

从夏德的论证来看，驻锡波斯的景教会大主教自称为叙利亚安条克教会宗主教，意在提高自己的声望，促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然而，当时景教以及波斯教会的情况似乎不能为这个观点提供有力的证据。540 年之后，安条克尽管被萨珊波斯占领，但是，安条克教会的宗主教职位由被拜占庭帝国视为异端的一性论派（Monophysitist）控制，并没有被景教会取代。其次，波斯教会尽管一直在名义上由拜占庭帝国的安条克宗主教管辖，但是，波斯的基督教团体历史悠久，拥有大批的信徒，早就显示出独立的倾向。在 410 年、420 年、以及 424 年召开的三次主教会议上（Synods），来自波斯各地的主教们联合起来强调波斯教会都主教（Catholicos）的权威，西方教会作为上帝与波斯信众之间沟通媒介的地位受到质疑，东方教区的都主教（the Catholicos of the Orient）被视为只需要向耶稣基督负责，被基督挑选担任教会的首领，由此，波斯教会脱离安条克教会的趋势拥有了教会法的基础，此时的波斯教会已经有意要与拜占庭帝国的五大教会（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利亚，叙利亚，耶路撒冷）平起平坐。再者，景教被拜占庭帝国定为异端教派后，被迫于 431 年流亡波斯，景教会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波斯教会的独立倾向，此后，波斯基督教团体有了支撑自己独立地位的神学体系。在萨珊波斯皇帝的支持下，景教的势力迅速在波斯发展，卑路斯统治时期（Peroz 459-484），景教的主教 Barsauma 在卑路斯的支持下血洗了反对聂斯托里学说的波斯教区都主教 Bā boway 及其支持者，498 年，景教会的大主教 Babowin 开始自称东方宗主教（Patriarch of the East，即景教碑中的东方法主），完全脱离西方教会系统。总之，到了贞观十七年，景教的教会领袖已经就任东方宗主教近一个半世纪，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景教传教士为什么还要借用安条克宗主教的名号来提高在远东的声望呢？

事实上，唐代史籍中的有关史料恰好反映出景教浓厚的波斯色彩。从贞观九年第一位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入华，到天宝四年玄宗下诏将两京景寺改名为大秦寺，景教传教士一直被称为波斯僧，表明了他们同波斯的联系。《唐会要》卷四九收录了太宗于贞观十二年（638）诏行景教的诏书，中云：“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此后有关景教的史料中也称景教僧为波斯僧，反映了这个称呼的稳定性。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约 713），道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记载了这位大德僧及烈在中国的活动，称他为波斯僧：

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可见，开元初年，景教僧是被称为波斯僧的。《唐会要》卷四九收录的天宝四年的玄宗诏书开篇就写到：

^① 有关考证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69-72 页。

波斯道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

这进一步说明在天宝四年之前景教一直被认为波斯教派。值得注意的是，在建中二年（781）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将贞观十二年太宗的诏书进行了修改，将“波斯僧阿罗本”改称“大秦国上德阿罗本”，表明此时的中国景教会有意削弱波斯色彩，转而强调他们与大秦的渊源。但是，景教会的努力似乎没有马上奏效，园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提到：

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蜜道》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道睿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道。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

由这段记载可知，天宝四年朝廷下诏将波斯经教改为大秦景教之后，教外人士虽然按照诏书将景教教堂改称大秦寺，但是仍然按照以往的习惯称景教僧为波斯僧。从10世纪末的敦煌文书中可以了解到，唐末宋初，景教僧仍旧被称为波斯僧，敦煌文书 S.1366 号《归义军使衙内麦油破用历》提到：

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

廿六日，支纳要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

又宋初出使高昌的王延德在《西州使程记》中提到：

复有摩尼寺、波斯僧，佛道所谓外道也。

根据向达教授、姜伯勤教授的考证，此处的波斯僧正是当地人对景教僧的称呼。^②由此可见，从京城到边地，从唐初到宋初，中国社会一直将景教僧称为波斯僧。

从贞观九年阿罗本入华到天宝四年朝廷正式承认景教教堂改称大秦寺，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这段时间也正是拂菻使者和拂菻僧频繁造访长安的时代，那么，景教传教士在入华初期，有没有可能由于不熟悉中国地理中关于西亚国家的各种名字，将波斯与拂菻混同，由此自称为来自拂菻的大德僧呢？

景教文献《一神论》约作于贞观年间，属于景教入华初期的作品。^③文中写道：

天道有一神，在天堂无接界，惣是一神，亦不在一处，亦不执着一处，亦无接界一处两处，第一第二时节可接界处。喻如从此至波斯，亦如从波斯至拂菻，无接界时节。

^① J. Takakusu (高楠顺次郎), "The Name of 'Messiah' Found in a Buddhist Book; the Nestorian Missionary Adam, Presbyter, Papas of China, Translating a Buddhist Sutra", *Toung Pao* vol. VII, 1896, 589-591.

^② 以上引文和考证转引自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③ 关于该文书的全面考察，见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187-207页。

^④ 《一神论》，喻第二，转录自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版，118页。

世尊共人相和，一切王打百姓自由，在拂菻向波斯律法如此，作恒索惣煞，诸声打破，破作丘坑，亦不须改向自家国土。

唯有世尊，情愿具足，欲此诸王等圣主，谁向拂菻，谁向波斯，並死，亦是恶律法，于所著者，为恒索到不堪处。所以一切拂菻，如今並礼拜世尊。亦有波斯少许人，被迷惑，行与恶魔鬼等，所作泥素形象礼拜者。

可见，《一神论》中的波斯和拂菻是不同的地理名称，前者指萨珊王朝的领土，后者指拜占庭帝国，显然，景教传教士们很清楚二者的区别，并没有将拂菻与波斯混淆。

天宝四年之后，景教改称大秦景教。尽管《旧唐书》开篇就说明，“拂菻，古大秦也”。但是，通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找不到有关拂菻的蛛丝马迹，相反，却可以发现碑文中存在有意回避拂菻的线索。景教文献《序听迷诗所经》很可能是景教入华初期的作品，文中这样记叙了耶稣诞生的事迹：

据此天尊在于天上，普署天地，当产移鼠迷师诃。所在世间，居见明果（星）在于天地，当产移鼠迷师诃。辛星居知在于天上，星大如车轮，明净所，天尊处，一尔（前后），生于拂菻园（国）乌梨师斂城中。^②

但是，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同样的事迹却被写成：

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提到，“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西域图记》很可能是隋初裴矩为隋炀帝所作关于西域地理的书籍，根据《隋书·裴矩传》中关于《西域图记》的引文，我们知道拂菻之名已经在此书中出现。尽管此书已佚，我们对于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不得而知，但是，宝应初年（762-763），杜环的《经行记》中已经明确了拂菻就是大秦：

拂菻国在苦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

可见，建中二年（781）景教会撰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拂菻就是古大秦的事实已经为人所知。唐代史料表明，自隋至唐，拂菻之名日趋流行，大秦所指的古代罗马帝国渐成陈年往事。我们从景教碑颂中也可以发现这个事实，碑文在解释大秦的地理方位时，只提《西域图记》和汉魏史策，却没有提到唐代的地志，说明景教会不想引导人们注意古代大秦同当代拂菻国之间的联系。景教会为什么偏要将自己同已经不大流行的大秦紧密相连，却不顺理成章地将罗马的当代名称拂菻归于名下呢？原因很可能在于：拂菻王波多力并非知东方景众的法主僧，波斯僧与拂菻僧分属于不同的基督教派。景教会选择大秦或许还包含着隐衷：他们的教派来源于大秦，即古代的罗马，他们不想同拂菻僧，即来自当代的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派别混为一谈。

^① 翁绍军，前揭书，152页。

^② 翁绍军，前揭书，102页。

^③ 翁绍军，前揭书，48页。

^④ 张一纯笺注：《经行记》，中华书局2004年版，14页。

三、拂菻僧弯与《酉阳杂俎》中的希腊药物学因素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八，广动植之三，木篇中记载了 19 种域外奇木（条 785-804），其中有 15 种或出产于拂菻，或有源于拂菻语言的专门称呼，文中还提到了拂菻国僧弯，正是这位来自拂菻的僧人向段成式提供了这些植物的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对这 19 种植物的记载具有非常规整的行文格式，下面试举一例：

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簪默，拂菻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橼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噉，亦可药用。^①

试再举一例：

槃柰穉树，出波斯国，亦出拂菻国，拂菻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②

总之，这 19 种植物都是按照同样的格式叙述的，首先是产地，在波斯、拂菻、印度语言中的称呼，然后是对植物形态的描述，其叙述顺序是：植物整体的大小，用较精确的数字说明；叶、花、果实及果实的味道；最后是对该植物用途特别是药物学用途的描述。这样一种规整严密的行文格式同本卷中的对其他植物的记载方式完全不同，试举一例加以比较：

仙桃，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祈之，辄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③

可见，段成式所记侧重于同植物相关的奇闻轶事，并非植物本身的形态学描述以及在不同语言中的称谓。《酉阳杂俎》中的有关拂菻波斯植物的记载是否出于唐代的药物学著作呢？选取《酉阳杂俎》卷十八，条 785，龙脑香，将有关记载同唐代几种主要的药典相关记载进行对比：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

再看 659 年修成的《新修本草》中的龙脑香条：

龙脑香，树形似杉木，言婆律膏是树根道清脂，龙脑是根中干脂，子似豆蔻，皮有错甲，香似龙脑，味辛尤道恶气，消食散胀，满香入口。旧云出婆律国，药以国为名，即杉脂也。江南有杉木，未道试，或方土无脂，尤甘蕉无实。

^① 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 1981 年版，前集，条 799。

^② 同上注，条 793。

^③ 同上注，条 766。

^④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武昌医馆丛书 1904 年重校本，卷十三，木部中品。又参见，尚志君辑《新修本草》，安徽科技出版社 1981 年版。

又，玄宗天宝年间陈藏器《本草拾遗》中关于波斯皂荚的记载：

阿勒勃，味苦，大寒，无毒，主心隔间热，风心黄骨，蒸寒热，杀三虫，生佛逝国，似皂荚，圆长，味甘好喫，一名婆罗门皂荚。

五代前蜀时期李珣《海药本草》中所记之龙脑香：

谨按陶弘景云，生西海律国，是彼律树中脂也，如白胶香状……镇心秘精，又有苍龙脑，主风疮。入膏煎良用，点眼则有伤。《名医别录》云妇人难产，取龙脑研末少许，以新汲水调服，立差。又唐太宗时西海律国贡龙脑香，是知彼处出耳。

将这三种有关唐代外来药物的代表作同《酉阳杂俎》卷十八中的记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别。这三种药物学著作侧重于描述植物的药用部分的形态，以及主治的病症。

《酉阳杂俎》卷十八中由拂菻僧弯提供的十九种西域植物，是按照脱胎于希腊古典药物学的阿拉伯药物学和音义总汇的原则撰写的，因此其格式才会明显不同于唐代的其他药物学著述。^③我们还可以发现，弯并非照搬希腊和阿拉伯药物学的内容，在他的记叙中，中国的度量单位丈、尺、寸取代了西方的肘尺（cubit）和拑尺（span），这说明弯很可能在中国生活多年，不仅精通希腊和阿拉伯的药物学，而且熟悉中国植物。

夏德和劳费尔已经指出，《酉阳杂俎》卷十八中提到的拂菻语属于某种阿拉米克语，并非希腊语。^④弯描述的植物可以分成三类：来自波斯和拂菻；来自印度；来自拂菻。如果植物产自拂菻，例如阿勃参和祇，就是该植物在拂菻的特殊用法。如果植物产于印度或波斯，接下来就是拂菻语的称呼，只是泛泛谈到在西域的用法。这说明拂菻是叙述中的重点，恰好呼应了弯拂菻国僧的身份。此外，波斯在弯的记载中也占据重要的位置，许多植物来自波斯或者有波斯语中的称呼，显然，弯熟悉希腊和波斯的药物，而且拥有印度药物的知识。弯一方面自称拂菻国僧即罗马国的僧人，另一方面，弯笔下的拂菻语言并非希腊文，汇集了希腊、波斯、印度的药物学知识。那么，弯的拂菻国僧身份就更加扑朔迷离，对弯的分析促使我们进一步提问，唐代史籍中的拂菻使者和拂菻僧究竟是从哪里出发来到中国的呢？

四、谁是拂菻僧？

前辈学者多认为，7 世纪初，拜占庭帝国面临着新兴的阿拉伯帝国的进攻，意欲联络远东的中国共同对抗阿拉伯人，因此，如同这一时期频繁造访唐王朝的波斯流亡王室

^①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卷十二，木部上品。

^② 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5-56 页。

^③ Tohn Goodyer tr., Robert T. Gunther ed., *The Greek Herbal of Dioscorides*, London, 1934. Franz Rosenthal, *The Classical Heritage in Islam*, London, 1975, p. 197.

^④ 劳费尔著 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260 页；又参见，Hirth，前揭文。

与中亚九姓胡一样,贞观十七年的拂菻使者是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外交使节。^①不过,此时远东的中国根本不被拜占庭帝国所了解,7世纪拜占庭史家西莫克塔(Simmocata)笔下的“陶格司国”恍若神话,拜占庭帝国怎么会指望如此“远水”解救“近渴”呢?^②事实上,当时拜占庭帝国全力同北方近邻突厥可萨汗国结盟,利用可萨人牵制了阿拉伯帝国的兵力,缓解了南部边境的军事危机。^③

从唐代史籍中的记载来看,从波多力到大德僧,拂菻使者显示出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拜占庭皇帝很少任命教士担任外交使节,送给西方各日耳曼王国的外交礼物多为高级丝织品、宝石、装帧考究的书籍,送给东方蛮族首领的礼物多为金币和金银器。来自拂菻的贡物却没有包括这些物品。贞观十七年的拂菻贡物包括赤玻璃、绿金精,后来的贡品还包括了药物(底也伽,667年)和动物(狮子、羚羊,719年),玻璃固然是拜占庭帝国的名产,它在当地属于日常器皿,不可能充当皇室赠礼。至于药物和动物更不可能列入拜占庭帝国的礼单。开元七年(719)的拂菻使者实际上是拂菻王下属的吐火罗大首领,他的出发地并非君士坦丁堡,而是中亚的吐火罗。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吐火罗传》: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覩货邏,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怛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

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犂,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鲁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贞观二十年(646),其王道提婆遣使者来献,书辞类浮屠语。

颇黎也就是玻璃,这段记载说明吐火罗地区出产玻璃和金精。从《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关于吐火罗贡物的记载来看,玻璃、金精和药物正是这一地区的特产:

开元十二年(724)七月,吐火罗国遣使献胡药、乾陀婆罗等三百余品。

开元十七年(729)三月壬寅,吐火罗叶护遣使来朝,同年七月,吐火罗使僧难陀献须那伽帝释菱等药。

开元十八年(730)吐火罗僧难陀来朝,贡献瑞菱、香药等。

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土(火)罗遣使献红颇黎、碧颇黎、生玛瑙、生金精及质汗等药。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贞观十七年首次入华的拂菻贡物同开元二十九年的吐火罗贡物如出一辙。

排除了拂菻僧为景教僧或拜占庭官方使者的可能性之后,7、8世纪之间,哪些基督教派别在中国会自称拂菻僧呢?在451年的查尔西顿公会议(the Council of Chalcedon)上,在拜占庭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和皇后普克里娅(Pulcheria)的主

^① 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104-105页。

^② 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第1册,88-89页。

^③ 林英《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14-21页。

^④ 关于金精的考释,见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508页。

持下，以叙利亚和埃及为基地的一性论派被定为异端。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坚持一性论神学观点的主教们或被免职，或者被迫逃亡。另一方面，那些拥护查尔西顿公会议决议，支持皇帝提高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举措的主教和信徒就构成了迈尔凯特派（Melkites）。Melkite 一词来源于叙利亚语中的 *mālkāyā*，意为效忠皇帝和帝国的人。从查尔西顿公会议之后到 616 年萨珊波斯占领叙利亚和埃及之前，迈尔凯特派依靠拜占庭帝国军队的支持，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城市中占了上风。迈尔凯特派的主教们管辖着讲希腊语的，效忠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们，一性论派则代表了讲叙利亚语的乡村居民和修道院体系的信仰。616 年，叙利亚被萨珊波斯占领，630 年之后又迅速成为阿拉伯占领区，从此，迈尔凯特派失去了拜占庭的军事保护，成为被新的统治者怀疑和打击的对象。由于忠于拜占庭的神学信条，迈尔凯特派在波斯被称为 *Rumagis*，即罗马人，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时代。^①

从 6 世纪末到 8 世纪，叙利亚的迈尔凯特派不断被迫向东方迁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 1 次发生在 540 年，当时波斯皇帝库思老一世（Khusro I）毁灭安条克城，将城中居民迁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phon）附近，令他们在此另筑新城，名为安条克。但是，这个城市在萨珊波斯时代通常被称为 *Rumaghan*，意为罗马人的城市。此后，泰西封成为迈尔凯特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据 10 世纪时的 Ibrahim ben Yuhanna 所著《安条克教会迈尔凯特派大主教克里斯托弗传》的记载，萨珊波斯时代，迈尔凯特派在波斯全境都有居住点，他们由安条克教会宗主教指派的都主教（*catholicos*）管辖，都主教住锡泰西封，之下又有主教负责管理各居住区。^②虽然受到萨珊波斯帝国政府的种种限制，但是，迈尔凯特派的规模仍然在扩大。J.M.Fiey 根据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中收藏的一枚印章认为，萨珊时代迈尔凯特派在中亚已经有了三个驻锡地。^③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保持自己的信仰，迈尔凯特派的居住区被承认为拜占廷帝国的飞地，都主教（*Catholicos*）及下属的主教驻地都保持下来。但是，7 至 8 世纪正是拜占廷帝国同阿拉伯帝国军事冲突频繁的时期。7 世纪中叶，杜环《经行记》描写拂林时提到，“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正反映了这些身处异国的“罗马人”的处境。762 年发生了迈尔凯特派的第二次大规模被迫迁移。当时，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计划在巴格达建立新都，他不想看到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有罗马人聚居，因此将迈尔凯特派的 *Catholicos* 及部分信徒迁往东方的边境城市 Chache，即昭武九姓中的石国。按照 Ibrahim bin Yuhanna 的记载：

^① Hugh Kennedy, “The Melkite Church from the Islamic Conquest to the Crusades: 马店 Continuity and Adaptation in the Byzantine Legacy”, The 17th International Byzantine Congress, Washington, 1986, Major Papers (New Rochelle, 1986), 325-343.

^② J.M. Fiey, “RUM A L’ EST DE L’ EUPHRATE”, *Le Muséon*, Vol. 90, 1977, 365-419.

^③ Ph.Gignoux, “Sceaux chrétiens d’ époque sassanide”, *Iranica Antiqua* (Gent), XV, 1980, 305-306. J.M.Fiey, “Le sceau sassanide d’ un catholicos melkite d’ asie centrale, *Proche-Orient Chrétien*, 45, 1995, 6-9.

哈里发决定将这些基督徒驱逐出他的领地，他们将他们迁移到波斯的边远地区，名为 Chache，这个移民的居住区又被称为罗马人（Rumagyris）之殖民地，Rumagyris 这个称呼也适用于其他迈尔凯特派团体。

从 9 世纪以后的文献来看，迈尔凯特派在中亚的居住地不限于石国一处，花刺子模的比鲁尼（Abu rihan Mohammed al-Bruni 973-1048）^①曾记载，在叙利亚、伊拉克、呼罗珊的大部分基督徒属于景教徒，也有一部分迈尔凯特派教徒。他的著作中还保留了一份迈尔凯特派的日历，从中我们了解到当时中亚有两个迈尔凯特派的聚居地，一个在谋夫（Merv），即隋唐时代的穆国，由 Barsibia 建立，直到 11 世纪仍旧存在。另一个在呼罗珊的首府尼沙普尔（Nisapur）。11 世纪后半期的安条克主教 Pierre III（1052-1056）在一封信中也提到，在呼罗珊和巴格达各有一个罗马人的主教（Catholicosats of Romagyris）。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测：7 世纪上半叶，当景教传教士在中国大获成功的消息传回波斯与中亚，居住在同一地区的迈尔凯特派教会领袖很可能受到鼓舞，派遣本派教士来到长安，如同景教士被称为波斯僧一样，迈尔凯特派传教士也会使用他们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通称——他们是罗马人（Rumagyris）的教士，即拂菻僧。

五、余 论

431 年聂斯托利派在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宣布为异端之后，被迫逃入波斯。在萨珊波斯皇帝的支持下，景教很快控制了波斯教会，由此拉开了景教东传的历史序幕。635 年，叙利亚被阿拉伯人占领。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萨珊波斯时代叙利亚和波斯之间的传统界限消除了。因此，“阿拉伯和平”（*pax Arabica*）实际上有利于景教之外的叙利亚基督教派别向东方发展。公元 7 世纪中叶以后，叙利亚的一性论派在两河流域建立了新的教区，而迈尔凯特派的东迁虽非主动，却在客观上促成了拜占庭正统的基督教派别进入中亚。由此可见，阿拉伯帝国取代波斯帝国之后，西亚和中亚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开始呈现出以景教为主，同时更为多样化的格局。拂菻僧没能像景教会那样在中国勒石为碑，将传教事迹昭示后人，说明这一基督教派别在唐代的活动还不能同景教会相比。然而，拂菻僧留下的药典片断还是提示着我们：7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阿拉伯和平”的到来，波斯与中亚的基督教会历史不仅仅是景教会的繁荣，而且还包括了原属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基督教派别的东来，因此，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色彩。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林悟殊教授的多次指教，谨此感谢。）

（责任编辑 辛 岩）

^① 参见费瑯编，耿昇 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 1989 年版，上册，180 页。